

·珍藏撷英·

字大如钱 墨光似漆

——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刊刻、流传和价值

王 鐸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礼记》经、注、疏合刊本,也是南宋浙江刻本中的代表作。文章通过对八行本《礼记正义》刊刻、流传及其收藏经过的考查,探讨了八行本的学术、版本和艺术价值,也说明了私家收藏在中国古籍流传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八行本 礼记正义 黄唐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6)05-0106-06

The Printing, Copying,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e Eight Lines Edition of Lijizhengyi

Wang 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eight lines edition of 70 volumes Lijizhengyi which is now preserved in Chinese national library is the eldest edition compiled Jing, Zhu, and Shu of Liji, and is also the representation of Zhejiang block-printed editions in South Song Dynasty. This thesis discussed the academic, edition, and artistic value by a review of its history of printing, copying, and preserving, and also explained the fact that bibliophiles had an important status in ancient books spreading history.

Key words: the eight lines edition; Lijizhengyi; Huang Tang; collect books

CLC number: K20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5-0106-06

《礼记》是一部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者论述先秦礼制的学术论文集。其自西汉末期戴圣编选完成,尤其是郑玄作“注”以后,地位日益上升,唐代取得“经”的地位,与《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并列为“五经”。历代学者十分重视对《礼记》的研究,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

郑玄,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是东汉经学家马融的高足。《礼记注》是一部笺释《礼记》的专著,注文

博综兼采,择其善者,力求简约、精确,以至于《注》文往往少于经文。郑玄简约精当的注文,与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的繁琐旧注相比,更易于读者阅览。宋卫湜说:“郑氏注礼,虽间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1]卫湜所说,道出了《礼记注》的价值。然而,及至南北朝时期,人们不但认为《礼记》难读,就是郑玄的“注文”,也难以通晓。故在唐太宗时期,就组织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

孔颖达,字冲远,唐冀州衡水(今河北冀县)人。唐太宗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累迁国子博士、给事中、国子祭酒,

封曲阜县子。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曾与颜师古、贾公彦等人融合汉魏以来南北经学家之见解,撰定《五经正义》180卷,《礼记正义》70卷就是其中之一。

《礼记正义》70卷,由孔颖达主持,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颖、张权参加,共同撰写。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周玄达、赵君赞、王士雄、赵弘智等覆审定稿。^[2]是书以南朝梁皇侃《礼记义疏》48卷为主,参考北周熊安生《礼记义疏》40卷等南北朝《礼记》研究成果,修撰而成。对于皇、熊的著作,孔颖达说:

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

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3]

此书前有一篇总序,广征博引,考证礼的起源与流变等问题;各篇小序,叙各篇之所属及来源等。正文疏解《礼记》经文和郑玄注文,确立“疏不破注”的原则,对郑《注》或疏证,或补阙,或考郑《注》之所据。对于皇氏、熊氏等人之异说,多加驳斥。为醒目考虑,每篇之中还分节统释段落大意,保存了一些南北朝时期佚书的内容。

对孔颖达之书,后人赞誉有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澧之流益如莛与楹矣。”^[4]意谓卫湜、陈澧的《礼记集说》,远不如孔书精善。吴承仕说:“孔氏略本熊、皇,博采众说,今欲上窥魏晋六朝旧义,惟恃此编,诚郑学之喉襟、礼家之渊薮也。清儒于各经皆有新疏,唯《礼记》独阙,将由孔《疏》翔实,后儒无以加,意包孕其弘,非一人所能了也。”^[5]这些评介是比较合理的。

自《礼记正义》完成以后,一直与《礼记》经文和郑玄《注》文分开别行,虽给学者研读《礼记》带来了许多不便,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将这一先进技术用于刊刻儒家经典,是后唐长兴年间(930—933)以后的事。孔颖达《礼记正义》70卷之“单疏本”(无经文和注文者)最早刊成于淳化五年(994),此本只残存8卷(卷63—70),今藏日本享延文库。

《十三经》经、注、疏之最早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年间。今

可考者有《周易注疏》13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20卷、《周礼疏》50卷、《礼记正义》70卷等。以上诸本,均是半页八行,故称八行本;刊于越东,又称越刊本。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是《礼记》经、注、疏合刊之最早刻本,是由当时的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主持刊刻的。

二

黄唐,字雍父,南宋三山(今福州)人。绍熙元年(1190)担任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并主持刊印了经、注、疏汇刻于一的《毛诗正义》20卷、《礼记正义》70卷。流传于今的《礼记正义》70卷,是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半页八行,故称“八行本”;卷末有宋绍熙壬子(1192)黄唐楷书跋文,故亦称“黄唐本”。

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40册,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南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原书板框高21.5厘米,广16.7厘米。半页八行,经文大字,每行十六字,注疏双行小字,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上记大小字数,鱼尾下题“礼记义几”,有若干页作“礼记正义几”、“礼记几”,惟第二十六卷前四页作“礼疏”。版心中记页数,版心下记刻工姓名。间有补版,亦精。刻工分两批,马林、马祖、毛俊等是原书版刻工,茅文龙、郑闰、陈庆等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见于补刊之页。避讳至宋光宗赵惇,故自玄、胤至慎、惇等字,皆缺笔。关于刻工和避讳,张元济先生在《宝礼堂宋本书录》一书中,有详细统计。

八行本书前是孔颖达《礼记正义序》,首行顶额“礼记正义序”五字,次行低二格题“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十九字,三行低三格题“敕撰”二字,四行顶额起《礼记正义序》文(见图一:《礼记正义序》一)。正文每卷首行顶额题“礼记正义卷第几”七字,次行低二格题“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十九字,三行低三格题“敕撰”二字,四行顶额《礼记正义》正文。(见图二:《礼记正义》卷第一、图三:《礼记正义》卷第二)孔颖达《礼记正义》文与《礼记》经文、郑玄《注》文用一黑底圆圈白文“疏”字隔开,字大如经文(见图四:《礼记正义》卷第一第六页);“疏”文中要解释郑玄《注》文时,先空一格,再用一黑底圆圈白文“注”字隔开,字大如“注疏”文,下先标“注”文起讫,后空一格,用“正义曰”三字起,解释“注”文(见图五:《礼记正义》卷第三第三页)。

八行本经文大字,字大如钱,墨光似漆;注疏小字,一笔

一画，一丝不苟。书体仿石经，端庄隽美，古朴大方；刻工亦是良匠，刀法利落，恰如其分，笔笔干净，不失神韵。加上楮墨，爽心悦目，揽书在手，墨香袭人，不忍释手。“其书法端凝、笔意浑厚者，当为最初刊本；补刊较早者，字体虽尚方严，而镌法已露棱角，再后，则用笔纤弱，镌刻粗率，与初版相较，截然不同。”^[6]这不仅是宋刻古籍善本中的精品，也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清人惠栋、陈鱣叹为“希世之宝”，近代大藏书家袁克文、潘宗周花重金收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行本自清初以来，历经各藏书名家收藏，收藏源流清晰有序。清初，八行本藏于季振宜家。季振宜（1630—？），字诒兮，号沧苇，清泰兴（今属江苏）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御史。家豪富，嗜藏书，是清初藏书大家。收藏宋元版、精抄本极富。其藏书处曰“辛夷馆”，室名曰“静思堂”。藏书印有“宋本”、“吾道在沧洲”、“季振宜藏书”、“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御史振宜之印”等。自撰《季沧苇书目》，中多宋元旧本，载其刊刻源流及行款面目甚详。康熙后，书多散佚，多半归于清宫天禄琳琅。

乾隆年间，八行本收藏于吴用仪家。吴用仪，号拙庵，吴铨子。吴铨，字容斋，人称容斋先生，清休宁（今属安徽）人，后定居长洲（今江苏苏州）。因生于新安之璜源，题其书屋曰“璜川”，亦曰“璜川书屋”，藏书印有“璜川吴氏收藏图书”、“璜川吴氏探梅山房”等。吴家藏书，自吴铨始，经其儿子吴用仪、吴成佐、孙子吴泰来（字企晋）、吴元润、吴英，至曾孙吴志忠，收藏甚富，多宋元善本。尤其是吴志忠，少承庭训，好藏书、刻书，极喜刻古人钞本及未刻之书，所刻以经书为多。与黄丕烈、顾广圻等人友善，故长于目录校勘之学。刻有《璜川吴氏经学丛书》、《璜川吴氏四书学》等。

八行本自吴家流出后，又归于曲阜孔继涵家。孔继涵（1739—1783），字体生，一字补孟，号荻谷，清曲阜（今属山东）人，孔子六十九世孙。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官户部主事。其雅志稽古，于天文、地志、经学、字义、算数之书，无不博览。官京师七年，手校书数千百帙。集汉、唐以来金石刻千余种，考核其事，与经义史志相比附。遇藏书家罕传之本，必校勘付梓，以广其传。钞藏书甚富，藏书处曰“荻谷斋”、“青枫斋”、“红桐书屋”。藏书印有“孔继涵印”、“荻谷”、“继涵之印”、“南洲”、“斲冰词客”。著有《红桐书屋集》。

光绪年间，八行本自孔家散出，归于郁华阁。盛昱（1850—1899），字伯羲，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进士。其深居简出，崇尚风雅，喜藏鼎彝图书，精鉴赏，藏

书处曰“郁华阁”，著有《意园文略》等书。郁华阁书散出后，大多归于完颜景贤，八行本亦在其中。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清满洲镶黄旗人，精鉴赏，富收藏，因得虞世南《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破邪论》卷册，颜其室曰“三虞堂”。藏书印有“金章世系景行维贤”、“完颜景贤精鉴”、“景行维贤”、“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庵印”等。

民国初年，袁克文用重金从完颜家购得此书。袁克文（1890—1931），号寒云，河南人，袁世凯次子。其藏书处曰“后百宋一廬”、“三琴趣斋”等，藏书极精，多宋元精槧，藏书印有“百宋书藏主人廿九岁小景”、“寒云秘笈珍藏之印”、“后百宋一廬”、“云合楼”、“八经阁”、“三琴趣斋”等。

袁克文书散出后，八行本被潘宗周收得。潘宗周（1870—1939），字明训，广东南海人。以经商起家，壮岁获交杨守敬等人，慨然有收书之志，平生喜收宋本，得百余种。从袁克文处收得曲阜孔氏旧藏宋刊《礼记正义》，即此八行本，海内传为孤本，遂颜其藏书处曰“宝礼堂”，张元济为其编有《宝礼堂宋本书录》。宝礼堂藏书精品，后全归国家图书馆。

惠栋、陈鱣、傅增湘、李盛铎、张元济、袁克文等藏书家，观览八行本后，均写有跋文。^[7]乾隆十四年（1749），八行本在吴泰来家时，惠栋据以校汲古阁本《礼记注疏》63卷，并写有跋文。陈鱣也撰有跋文，见《经籍跋文》。1912年，傅增湘在盛昱郁华阁看到八行本，写跋文一篇，收入《藏园群书经眼录》。1916年，袁克文收得八行本后，撰跋文记述得书经过；李盛铎在袁氏“三琴趣斋”看到此本，亦写跋文一篇，收入《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张元济替潘宗周撰《宝礼堂宋本书录》，其中《礼记正义》跋文，对八行本的流传、特征做了详细记录。《中国版刻图录》，也著录此书，并有跋文。

今藏国家图书馆的八行本，正文末尾有黄唐跋文和校正官衔名（见图六：黄唐跋文、图七：校正官衔名），另有清惠栋跋（见图八：惠栋跋）、李盛铎跋（图九、十：李盛铎跋）和袁克文跋（图十一：袁克文跋）。

八行本在流传中，董康曾以八行本原书用珂罗版印行，附有惠栋跋文，共16册。及归潘宗周，潘氏于民国十六年（1927）将其影印问世，不附惠栋跋文，共4函24册；又另覆刻书版，赠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84年，中国书店与上海市文管会经商量，加以重印，计4函24册。

目前正在编纂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着“继绝

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依照原书版式影印,采取传统的线装加蓝布函套方式统一装帧,计4函40册,并经教育部惠赠百所高校。这种化一为百的举措,为学人研读古文献,提供了方便。本文所使用的图片,即据《中华再造善本》中八行本拍摄。

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国家图书馆尚收藏有一残本,存28卷(卷3—4、11—18、24—25、37—42、45—48、55—60)4册,原藏涵芬楼,有张元济跋。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载,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亦藏有残本。北京大学藏本,存卷1至2,共33页,宋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元补修本。蝶装,半页八行,行十五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二、三字,白口,左右双边,框21.5厘米,广16.5厘米。版心上有字数,下有刻工姓名。有元人“君子堂”、“风流八咏之家劝谊彦忠书记”、“吴兴沈氏以万书世家作文”三印及明晋府“敬慎堂藏书印”、“子子孙孙永宝用”二印。^[8]上海图书馆藏本,残存卷数不详。日本足利学藏有残本,存62卷,缺卷33—40。

三

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堪称古籍善本中的珍品。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足利学所藏残本,显非完帙;董康、潘宗周覆刻本,略有取舍。惟《中华再造善本》中之八行本,依照原书版式影印,大小如一,可与原本媲美,其价值之重要,恰在于此。

第一、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是目前所知最早而又完整无缺的《礼记》经、注、疏汇刻本,因此,对于研究《礼记》,具有重要的版本和校勘学价值。现存最早的《礼记》白文经、《礼记注》刻本,亦不过南宋初年;《礼记》单疏本,今只存古卷子本《礼记·曲礼》残卷和北宋淳化五年(994)刻《礼记正义》残卷,残存8卷(63—70);附有唐陆德明“释文”的《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今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刘叔刚刻本,半页十行,故又称“十行本”。十行本虽然也是《礼记》经、注、疏之汇刻本,但刊刻时间要晚于八行本。清嘉庆年间,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因八行本难求,故退而求其次,《礼记正义》之校勘,乃选择十行本作为底本,而以明李元阳刻闽本、明万历国子监本、明毛氏汲古阁本、惠栋校本参校。惠栋校本是以汲古阁本《礼记注疏》63卷为底本,用八行本校勘,将异同全部注出。经过近两百年的流传,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阮元等前辈难得一见的八行本,不仅完整流传于今,度

藏于国家图书馆,而且经过影印,广为流传,学人比较容易拜读,并可用以校勘《礼记》经、注、疏。八行本版本学和校勘学的价值,于此可见。

第二、保存在八行本后的黄唐、惠栋跋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尚不知《十三经》经、注、疏、释文各自别行,分别经、义、释文之别行,始于清卢文弨。后卢文弨的弟子臧庸参以师说,将其手校《十三经注疏》见示于段玉裁、阮元等,于是始有重刻《十三经注疏》之议。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时,设“十三经局”辑《校勘记》,延聘段玉裁总其成,何元锡、臧庸、顾广圻诸人分任其事。是时《十三经》经、注、疏(或正义)、释文别行之说,已是众所周知。然而关于《十三经》经、注、疏合刊之时间,意见不一。段玉裁认为合刊于北宋,顾广圻认为合刊于南宋初。顾广圻曰:“北宋本必‘经注’自‘经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其后始有‘附释音注疏’。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岳珂、王应麟、马瑞临诸君,以宋人言宋事,条理脉络,粲然可寻。而日本山井鼎《左传考文》所载《绍兴辛亥黄唐跋礼记》语,尤为确证。安得有‘北宋初刻《礼记注疏》’及‘淳化刻《左传注疏》’事乎(段玉裁说)?”^[9]此说出,段氏大怒,段玉裁本推荐顾广圻入“十三经局”校《十三经注疏》,因此致使顾广圻离开“十三经局”,为张敦仁刻抚州公使库本《礼记郑注》,撰《礼记考异》,以成己志。后两人围绕《礼记》一书展开争论,各持己见,竟成水火,互相谏斥。

考《十三经》经、注、疏萃刻本,莫先于浙东提举茶盐司本《易》、《书》、《周礼》三书。八行本黄唐跋文记载的十分清楚。跋云:

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义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缺。绍熙辛亥(1191)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钁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1192)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据《宝庆会稽续志》可知,黄唐于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任职浙东,其衔为“朝请郎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山井鼎《左传考文》误“绍熙”为“绍兴”,故顾广圻亦误引。^[10]提举常平司始设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始名其长官为“提举常平茶盐公事”。^[11]八行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刊工相同者有毛昌、朱明、徐茂、陈锡、梁文等,多系南宋

时杭州地区良工；《周易注疏》之初版刊工多散见绍兴间浙本。^{〔12〕}故可断定，《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实为《周礼注疏》）最早当刊于南宋绍兴年间，即公元1131—1161年的31年间。

黄唐跋文，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八行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经、注、疏汇刻本，是两浙东路茶盐司最早刊刻，时间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记载准确无误地说明，《十三经》经、注、疏之最早汇刻始于南宋，也证明顾广圻之是、段玉裁之非。二是黄唐担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期间，又续刻了《毛诗正义》20卷、《礼记正义》70卷，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完成于绍兴三年（1192）八月。如果没有黄唐的跋文，这两个问题是说不清楚的，顾广圻、段玉裁之间的争论，也一直会延续下去，何时结束，更无法预知。

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因流传广泛，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但对其刊刻质量，少有评价。惠栋利用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校勘汲古阁《礼记注疏》63卷，并撰写跋文。文云：

拙庵行人购得宋槧《礼记正义》示余，余案《唐艺文志》，书凡七十卷，此本卷次正同，字体仿石经，盖北宋本也。先是，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法周秦遗意，与经、注别行，宋以来始有合刻。南宋后，又以陆德明所撰《释文》增入，谓之《附释音礼记注疏》，编为六十三卷，监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岁久脱烂，悉仍其缺。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讹字四千七百有四，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缺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异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篆文九百七十有一，校讎是正，四百年来阙误之书，犁然备具，为之称快。唐人“疏义”，推孔、贾二君，第《易》用王弼，《书》用伪孔氏，二书皆不足传。至如《诗》、《春秋左氏》、《三礼》，则旁采两汉南北诸儒之说，学有师承，文有根柢，古义之不尽亡，二君之力也。今监板毛氏所刻诸经，颇称完善，唯《礼记》阙误独多。拙庵适得此书，可谓希世之宝矣！拙庵家世藏书，嗣君博士企晋，尝许余造“璜川书屋”，尽读所藏，余病未能，息壤在彼，请俟他日。因校此书，并识于后云。己巳秋日，松崖惠栋。

惠栋此跋，是在吴泰来家“璜川书屋”，利用八行本校勘汲古阁《礼记注疏》后所写，时间是乾隆十四年（1749）。跋文指出汲古阁本《礼记注疏》讹、脱、阙、衍文字万余处，说明汲

古阁校对之粗疏。

第三、通过李盛铎、袁克文跋文和八行本之印章，我们可以准确和全面地了解八行本的收藏经过，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私家收藏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李盛铎跋文云：

诸经“疏义”，本自单行，注、疏合刻，始自何时，前人无能详言之者。今注、疏流传，仅有南宋十行本，其卷帙与单疏本不合。乾嘉诸老，搜获钱孙宝景钞《周易注疏》十三卷、沈中宾刻《左传正义》三十六卷，已悟十行本改移卷第之非。咸、同中，仁和朱氏得五十卷本《周礼注疏》，而日本影刻《尚书正义》，亦流传中土，独惠松崖先生所校七十卷本之《礼记正义》，相传由璜川吴氏，转徙归曲阜孔氏者，沉晦百余年，嗜古者，几疑秘帙，已不存天壤。光绪丁、戊之交，颇闻此书复出，为郁华阁所收，珍秘不肯示人。余归自东瀛，伯羲前辈已归道山，篋册尘封，无由得见。壬子之夏，郁华书籍散出，是书展转，归“三琴趣斋”插架，可谓得所归矣。按黄唐跋，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绍熙辛亥，唐备员司庾，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校正锓木。是绍兴庾司，为注、疏第一合刻之地。《诗》、《礼》二疏目，即为唐所合编，故它经后仅附唐跋，此经独列校正诸官衔名，于是注、疏合刻之地与时，无如此明白者。是此刻为《礼记》注、疏合刻第一祖本，又为海内第一孤本，安得假瞿氏之《易》、朱氏之《周礼》，并此本影写付刊，俾注疏祖刻，复得流传宇内，不亦艺林快事耶？丙辰惊蛰后二日，盛铎识。

李氏跋文，对八行本之流传及《十三经》经、注、疏之汇刻，均作了考论。据跋文记载，袁克文收藏到八行本的时间是1912年，此跋作于1916年惊蛰后二日。

袁克文跋，也记载了收藏八行本的经过，可与李盛铎跋互相补充。袁克文跋云：

黄唐刊《礼记正义》七十卷，久著声于人寰，陈鱣跋文，曾详记之，且校订异同。盛昱藏书散出，即归其戚景贤，悬重值求沽，议者皆不谐，是时，予居天津，亦欲购而未果。旋作南游，遂绝消息。比移都下，知尚在景家，因丐庾楼妹倩，代为论值，遂以万金并得《纂图互注周礼》、小字本《春秋胡传》、《黄注杜诗》、黄善夫刻《王注苏诗》、《于湖居士文集》

五书,皆瑯環秘宝,因结“佞宋”之癖。经年所获,已可盈百,爰辟一廛以贮之,而以此书冠焉。洪宪纪元三月十三日,寒云记于云合楼。

袁氏跋文不仅记述了得书经过、同得之书及价值,更有意思的是,用仅存八十三天的洪宪年号纪年,而此跋之撰写时间,距离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仅隔八天,也算是儿子对老子的一点支持吧。

至于八行本之藏书印章,也反映了八行本的递藏经过。图一有“秋壑藏书”(朱文方印)一方,傅增湘认为是伪印;^[13]若是真迹,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因“秋壑”是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号,贾氏喜欢收藏古物字画和善本书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春秋左传正义》36卷,也有此印,亦不知真假。^[14]图一有“北平孙氏”(朱文方印)一方,系孙承泽印。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又号退谷,明末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祖籍山东益都。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入清,官至吏部侍郎。熟悉明代掌故,博古精鉴,藏书极富。所藏有元版《春秋纂例》等。其藏书处曰“研山斋”、“万卷楼”,藏书印有“北平孙氏研山斋图书”、“孙氏万卷楼印”、“承泽”等。此印表明此本在明末清初曾经孙承泽收藏过。

图一、图二之“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朱文方印),图一之“金章世系景行维贤”(白文长印),图二、图三、图八之“景行维贤”(白文小方印),图二之“完颜景贤字享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庵印”(白文方印),图六之“完颜景贤精鉴”(朱文方印)等,都是完颜景贤印。

图一之“寒云秘籍珍藏之印”(朱文长印),图二之“佞宋”(朱文小方印)、“克文”(朱文小方印)、“人间孤本”(白文方印),图七“寒云主人”(白文方印)、“孤本书室”(朱文方印),图十一“无垢”(朱文方印)、“寒云庐”(朱文长印)。

图八之“惠栋”(白文小方印)、“定宇”(朱文小方印)是惠栋印章。图十(见封面)有“李氏木斋”(朱文小方印)一方,是李盛铎藏书印。

另,图一、图七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一方。图二有“咸熙堂鉴定”(朱文长印)一方,图八有“虎豹窟”(篆文长印)一方,不知谁印。

这些印章,大致反映了八行本自明末清初以来的收藏

经过,自孙承泽、季振宜、吴泰来、孔继涵、盛昱、完颜景贤、袁克文、潘宗周,最后到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递藏十分清晰;同时也见证了历代藏书家为此本之流传所付出的艰辛。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既不会有以上的故事,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喜悦。

就我国古文献而言,假如没有历代私人收藏家的付出,国家图书馆等藏书单位,古籍善本的收藏会是什么样子呢?面对求书若渴的读者,在图书馆寻求善本,意欲研究一番时,图书馆又该如何对待呢?希望图书馆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再好的善本,若无人读、用,则与废纸无异。

参考文献:

- [1](清)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735下.
- [2](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33.
-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22-1223.
- [4](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265.
- [5]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M].广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
- [7]王锴.三礼研究论著提要[Z].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269-274.
- [8]张玉范,沈乃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
- [9](清)顾广圻.顾广圻书目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0]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J].文史,第3辑.
- [11](元)脱脱.宋史·职官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2]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李致忠.宋版书叙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0.

作者简介:王锴(1965-),男,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和“三礼”的研究。